

鲁彦周文集

LUYANZHOU WEN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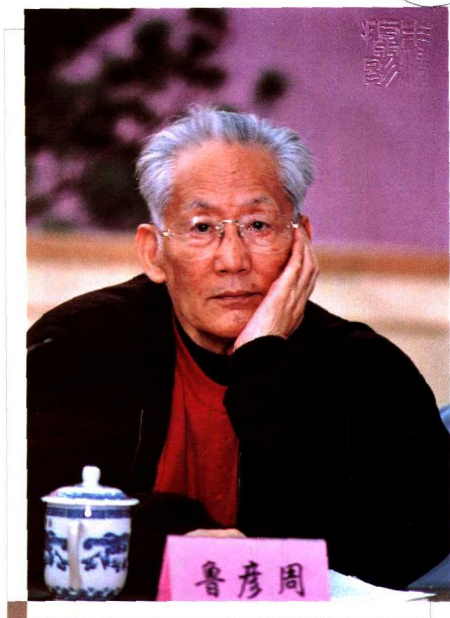


 安徽文艺出版社

LUYANZHOU WENJI

鲁彦周文集

1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彦周文集/安徽省文联,安徽省电影家协会编选.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2.10

ISBN 7-5396-2181-8

I. 鲁… II. ①安…②安…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
- 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6759 号

鲁彦周文集 安徽省文联 安徽省电影家协会 编选

责任编辑:徐海燕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省地质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72

插 页:6

字 数:4,100,000

印 数:1600

版 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181-8

定 价:(精)330.00 元 (平)29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鲁彦周小传

鲁彦周，男，安徽巢湖人，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出生于巢湖北岸一个农民家庭；幼时颇历艰辛，种地牧牛，读了几年私塾，后来也上了两年中学；参加革命队伍后，靠自学为自己补了课，也为以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五十年代早期，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五四年开始发表自己的小说，随后就源源不断发表作品。鲁彦周既写小说，也写戏剧和电影文学剧本，有小说集和散文集出版。话剧剧本《归来》曾获一九五六年全国话剧汇演剧本一等奖；电影文学剧本《凤凰之歌》曾获一九五八年文化部电影剧本征文奖。一九五九年英国剑桥版《世界名人录》曾收入其传略；中国作家辞典及各种名人录皆收有他的传略或介绍。

“文革”十年，鲁彦周停笔十年，但从一九七八年后，作品又如泉水涌出，有多部小说和电影剧本或发表或拍摄。长篇小说《彩虹坪》、《古塔上的风铃》、《阴阳关的阴阳梦》、《双凤楼》在国内均有好评；中篇如《天云山传奇》、《呼唤》、《逆火》等，有的被改为电影、电视，有的在国外获奖（如《逆火》），有的得全国大奖（如《天云山传奇》曾获全国中篇小说一等奖，拍成电影后，还获得金鸡奖、百花奖等，并被译成德文、日文、俄文等文字在国外出版）。此间，鲁彦周还创作了大量电影剧本，如《柳暗花明》、《巨澜》、《廖仲恺》等等。他的大量散文小说曾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影响，并获得多次奖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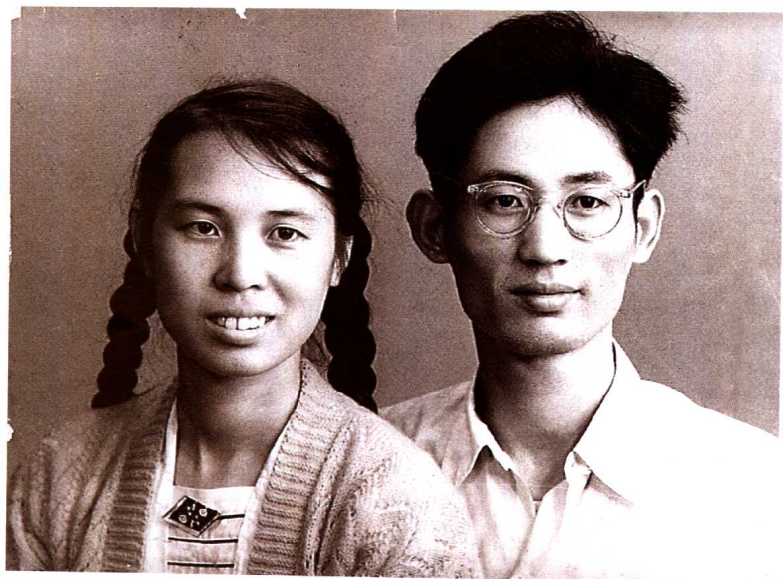
鲁彦周曾多次被评为安徽省和全国劳动模范，曾是安徽省政协常委、省人大代表；一九八二年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鲁彦周曾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电影家协会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

本文集系鲁彦周主要作品选集。



1961年元旦,周恩来总理接见并宴请部分作家、艺术家。第二排左起第一人为鲁彦周。

前排左边第二人起:柯仲平、贺绿汀、方令孺、白杨、周恩来、张瑞芳、草明。第二排左起:鲁彦周、杜宣、叶以群、欧阳山(右边一人记不清是谁)、于伶、张骏祥。后排左起:刘厚生、郑君里、赵丹(右边一人记不清是谁)、石凌鹤、徐平羽、孔罗荪、黄佐临、马烽、沙汀、陈鲤庭。



1959 年的鲁彦周与夫人张嘉



1958 年于淮北农村



1948 年于贵池县



1949 年渡江战役前后



1976 年文革结束后重新开始写作



祖父鲁凤翥



父亲鲁邦裕



母亲钱乃珍和外孙女萌萌



1963年在巢县鲁集村合影

前排左起：三女鲁书江、侄女鲁彩霞、大女鲁书妮、儿子鲁书潮、二女鲁书英。
 第二排左起：堂姐鲁晓英、岳母张秀华、母亲钱乃珍、岳父张世华、父亲鲁邦裕。
 第三排左起：弟媳陈华英、弟弟鲁家萃、鲁彦周和妻子张嘉。



写完《天云山传奇》与妻子在巢湖合影



八十年代初全家合影
小女孩为张嘉的侄女张珏



1988 年在北京召开的《古塔上的风铃》座谈会上
左起：冯牧、陈荒煤、雷达。



在《古塔上的风铃》座谈会上
右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责任编辑赵水金



在《古塔上的风铃》座谈会上
左为文学评论家江晓天



2001 年在广州赖少其纪念馆
左起：柏龙驹、鲁彦周、鲍加、刘景龙、张松。

自序

在各方面的鼓励和推动下，我终于下了决心编选这套八卷本文集。

编文集的事我之所以迟迟不愿进行，除了客观因素外，主要还是觉得自己创作的成就不够——我一直还在期待着自己的创作有一个新的高峰出现，还在想有一天真正拿出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但是我也清醒地知道，我这个主观愿望是非常艰难甚至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因为我毕竟已是七十四周岁的人了，我的时代已经过去，精力和才能都不可能再重新创造一个颠峰时刻。那种期待另一个高峰的想法其实颇多理想的梦幻色彩，我虽然并不排除努力，但还是清醒一些为好，因此我还是决定从现实出发，先把这部文集编印出版，往后若是真能有满意的作品出现，那和这部文集的推动也一定有关。

关于外界对我自己多年来创作的评价，实在不想多说，虽然一段时间内，评论家和读者对我的作品也曾出现过评论热潮。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八十年代至九十年

代都曾有过。我的一些作品被评论家们给予极大的鼓励,五十年代的话剧《归来》、电影《凤凰之歌》和《风雪大别山》出现时都曾有过相当大的评论热潮;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及同名电影,长篇小说《彩虹坪》、《古塔上的风铃》、《双凤楼》,中篇小说《逆火》以及电影《廖仲恺》等等,也在不同时期得到评论家、读者与观众的支持。在这段时间内,国外对我的作品也有翻译和评论,也曾拥有不少读者。我的一位极有影响的作家朋友在一篇访德文章里还曾说过一件事,他说他有次在德国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个德国姑娘在看书,他问她看什么书,她说我在看鲁彦周,她说的是在看我的小说,这使我的朋友大感兴趣,回来就把这事写进文章里。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对我真是一个鼓励和鞭策。我在前苏联和日本也曾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当然对于国内外的有关我的作品反映,我自己很少和人谈及,更从未因此而头脑发热膨胀。我对自己的作品一直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我总觉得我没有在创作上达到应有的高度。别人的评价那是鼓励,自己不应当拿这些当作资本。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作品自满自足,没有时下一些作家的那么好的自我感觉,这也许是我缺少自信的表现。这次在编这套文集时曾有同志建议,是不是把有关评论界对我作品的评论文章,也编成一本书放在这套书的后面供读者参考?我考虑了一下还是放弃了,何必呢?有这套文集就够了,作品已经摆在这儿了,读者自会有客观评价的,还是让读者来鉴定吧,我把人家的评论都放进文集里,那样就明显有时下流行的所谓炒作

的味道了。而我是一向不赞成对自己进行炒作的。

二

我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学习写作的，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手稿去年在上海被发现，上海有关报纸都曾报导，但那实际上只是我的学习写作的开始。我真正接触文学是在到了合肥皖北文联后，也是在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想当一名作家先天的条件是多么不足，我甚至怀疑自己这个理想是不是太天真太狂妄了？

我是从巢湖市的巢县（现居巢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中走出来的，我的祖父一字不识，父亲识得一些字，但也仅仅是识几个字而已，他也是道地的农民。而我的家乡又是一个在巢湖说来是偏僻穷困而又闭塞落后的地方。我们村虽然不小，有一百多户人家，但从来没有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小学，孩子们要学点文化只有在村上的祠堂的私塾里就学。私塾！那是一个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还要读几千年以前的“经书”的地方，是读死书硬背书的地方，那里和时代远离，不教任何新的科学知识，最多只能使人识得一些古文。我的基础教育就是从这里获得的。那时我时读时辍，有时念书，有时帮助家里干农活，或是放牛、放鹅，还逃过荒。就这样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抗战胜利后，我想跳出家乡，千方百计设法补习考学校，历经艰辛，总算在江南以同等学历上了高中，一九四八年甚至还在贵池一所国学专科学校读了近三个月的书。但是事实证明，我在那时的社会里是无法生存也找不到出路的，国民党搞的金元券改革使我在江南饭也吃

不上了。淮海战役开始后，我毅然决然回到家乡参加了革命。

我在江南两年多的读书时间，最大的收获便是开了眼界，读了不少“五四”以来的进步作家的作品，也读了一些外国古典文学。同时，我对国民党的政权彻底失望了，这也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没有历经艰辛到江南求学这一段，也许我只是一个一般的所谓工农干部，或者干脆只是一个农民。

三

我从幼年时就热爱文学，那是我从一个私塾同学家里偷看《西厢记》、《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开始的。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些经典性的作品时，我的确惊喜万状，原来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神奇的书，这比我正在读的经书可是有趣得多了。后来我又陆陆续续读到《聊斋》、《平山冷燕》以及其他文言小说和笔记小说等，与此同时我还在一位新四军女宣传员手中读到了鲁迅的作品及其翻译小说，这使我更为惊奇，原来也可以用现代的口头语写书的，而且写书的人是多么有学问啊！我也是从鲁迅这里知道“文学”这个词，知道了中国还有许多文人在搞文学，并且从这里产生了想做文学家的模糊的梦。

后来我终于在江南进了现代意义上的洋学校。我在学校里又读到了更多的中国的新文学作品和一些翻译小说。我才知道过去我的知识是多么贫乏，这些文学家是多么可敬，由此更加觉得文学事业的可贵，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我的文学之梦也就从模糊的向往，变

为现实的追求。但是我的梦得以体现,并且能够逐步得到升华和提高了的还是我进入皖北文联之后。而这个梦的实现实在要感谢当时任皖北行署文教处处长的戴岳同志,是他使我得以进入文艺单位的。

这是我的人生又一次迈出的重要一步。

四

我的文艺观的形成也是在五十年代初,在这时,我曾利用病假期学着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的胆子很大,我写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江南某地的一所学校里的生活。那时我的思想里并没有框框条条,我更多的是受三十年代作家们的影响,只是写我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收在文集第五卷里的长篇节选本《丹凤》。

到了皖北文联之后,我接触到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也开始接受文艺上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接触了解放区的文艺作品,这时才知道了党对文艺家的要求,知道了一个新中国的文艺家所应当遵循的道路。我当然觉得这些都是神圣的,是理当如此,必须严格遵守的。我过去所喜欢的,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是应当摒弃、应当接受改造的。我无条件地接受了自认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观。

与此同时,对我还有一个重要影响的是:有了进一步的自学机会。那时我像一个从沙漠中走来的严重饥渴的人,在文教处的资料室里大量吸饮中外文学名著,并且为了充实自己,还大量阅读了中外历史书籍。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为了圆我的文学梦,我必须对自己

的先天不足进行补课，我不仅要读书，要认识中外作家及其作品，我还要读中国的革命书籍，要懂得一些中国革命的历史，而且还要知道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基本历史发展概况。因此，从五十年代初到反右运动前，我大量读书并同时努力进行创作实践。这一时期，是我精神焕发地自己进行补课的重要时期，我的一些文学知识和基础都是在这时期打下的。

这个时期我还像我的同时代许多作家一样，除了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便是实行解放区的文学实践，学习苏联文学。在理论上则是贯彻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这一创作方法当作原则。我也时时遵守一种教导，文学只是党的工作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是党的宣传和教育工具。这些都是原则，是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的，违反了就要受到批判。

在文艺观上是如此。在政治上，那时年轻热情，我是真诚地拥抱革命拥抱现实，对于党所提倡的，都视为神圣的，毫不迟疑地努力贯彻并且努力实践来证明自己确在响应党的号召。我极积参加各种运动如土地改革、反匪反霸、抗美援朝等等，不仅积极响应，而且大胆地进行创作实践，以此来配合党的中心任务。我深入淮北乡村，搞互助合作，参加治淮、生产救灾，等等。这一时期我写了所谓配合任务的作品，也写了一些自己的对现实的真实感受的作品。这一时期，我精神状态颇佳，我的成名作，首次获全国大奖的《归来》，我的电影文学剧本《凤凰之歌》以及一些短篇小说，都是在这时期产生的。这个时期国内的政治气氛还是比较好的，因而在创作上

也没有多少顾虑,对于写作,对于文学,也逐渐有了自己的认识。

但是不久反右斗争就开始了。这次所谓运动,在刚开始时,我还糊里糊涂,根本没有想到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后来形势越来越严峻越恐怖了,我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惶惑和恐惧。再后来,我目睹了一大批我们单位和社会上一批有能力有才华的同志,一夜之间就成了“阶级敌人”,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更感到事态发展的可怕。我像一只惊弓的鸟,虽然躲过了飞箭,但在内心深处,对于我的影响则是严重的。

反右以后,众所周知:大跃进开始了,人民公社开始了,大炼钢铁开始了,中国大地几乎弥漫疯狂的状态。这时我也被一种现象迷惑了。几乎是全民的热情燃烧,当然也感染着我,我也从反右时的惊慌中苏醒过来了。我和陈登科同志奔赴淮北,我们也投身到当时的大搞水利大搞河网化的群众运动中去了。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写了一本小册子散文集《淮北寄语》;后来我和登科两人又奉命写有关这方面题材的电影剧本,我们合作写了《卧龙湖》、《柳湖新颂》;我自己还写了《三八河边》。这些作品,实际上是对当时浮夸风的吹捧,虽然像《三八河边》曾得到中央负责人的表扬,周总理甚至认为《三八河边》是张瑞芳同志表演得最好的一部戏,但是事实证明,这样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今天回顾,只能增加自己的惭愧。